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成果

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研究

Studies on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ers Training

郭兰英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研究/郭兰英著.—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03-020324-3

I. 口... II. 郭... III. 口译-人才-培养-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070 号

责任编辑:郝建华 刘彦慧 / 责任校对:张怡君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编务公司排版制作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A5(890×1240)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 1/4 插页:2

印数:1—3 000 字数:220 000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科印)

序

兰英教授来函嘱我作序，该书的责编也随即将书稿校样寄来。我乐意为之，有两个原因：一是引我“温故”；二是令我“知新”。

引我“温故”的是，我本人可谓口译“出身”，从1972年第一次做口译算起，迄今已逾35年，应该算是一名“老兵”了。几十年来，每每看到口译方面的书，都会联想到自己做口译、教口译、研究口译的情形，的确是有一种“重温”的亲近感。这次也不例外。

令我“知新”的是，关于口译理论研究和口译教学研究的书，我看过不少，但关于口译人才培养研究的书却见的不多。兰英教授的书，令我了解不少新知，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

根据作者的愿望，这本《口译与高校口译人才培养研究》是想达到以下几个目标：（1）帮助高校教师、学生对口译理论、口译教学进行认知；（2）分析我国口译市场需求现状与前景，了解口译的社会出口及其定位标准；（3）梳理我国目前口译资格认证项目，使口译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准确把握自己的方向，提高相应口译能力及口译资格考试应试能力；（4）进行高校口译教学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特别是“语言游戏论”指导下、合作原则基础上的层级性互动模式研究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及（5）为我国口译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看完书稿，我觉得作者编著该书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

兰英教授书稿中的以下三点，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在当前口译人才社会需求强盛、社会定位较高的情况下，如何培养符合不同社会定位的、高质量的层级性口译人才与口译能力。我认为，轻视口译是一种“无知”，但一哄而起，又是一种“盲目”。书中提出的“不同社会定位”和“层级性口译人才与口译能力”，颇有见地。

二是，本书提出了口译理论研究、口译人才培养、口译能力的普及

与大众化提高等一体化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其中提出“口译能力的普及与大众化提高”，这一点我在其他同类著述中没有看到，可以说颇具新意和前瞻性。它的意义在于，不要把口译说得过分“高超”和“神秘”；也不要一提到口译，就只想到去“联合国”或坐在国家领导人身边当译员。口译能力的普及与大众化提高也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三是，本书提出了口译人才培养的规范化问题。市场的需求在带给人们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负效应。各种口译培训班参差不齐，优劣难辩，影响了口译人才市场的质量与信度。该书提出这个问题，恰逢其时。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市场需求与高校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研究》和浙江省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市场需求与高校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研究》的主要成果。此书的出版，我相信会受到高校教师、各专业研究生、本科生、高职高专生、口译研究者、口译学习者，以及其他口译爱好者的欢迎。

是为序。

胡庚申

2007年11月28日于清华园

前言

口译人才培养取决于社会需求定位与社会出口。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口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需求定位也越来越高。受市场的驱动,各高校和培训机构的口译教学蓬勃发展;然而,市场的需求在带给人们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各种口译培训班参差不齐,优劣难辨,影响了口译人才市场的规范化与可信度,高规格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迫在眉睫。

本研究通过对中外口译及口译人才培养的历史与发展的梳理,讨论我国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我国口译人才培养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翻译学院的高级口译人才学历、学位教育;二是普通高等院校的口译教学;三是各层次的口译培训班。口译人才市场需求定位很高,要求心理素质、语言能力、反应能力、专业水平、百科知识、应对或应变策略、交流和交际技巧乃至仪态的(felicity)得体 and 所谓的“becomingness”适境等等。因此,口译人才的培养只靠短期培训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质量和标准的。

本研究强调口译人才与口译能力培养的差异,并重点探讨高校本科口译教学的目标定位及大学生口译能力的提高。

本书编写的目的:

编写《口译与高校口译人才培养研究》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几个目标:1. 了解国内外口译发展的历史,分析我国口译市场需求现状与前景,了解口译的社会出口及其定位标准。2. 帮助高校教师、学生对口译理论、口译教学进行进一步的认知;3. 梳理我国目前口译资格认证项目,使口译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准确把握自己的方向,提高相应口译能力及口译资格考试应试能力。4. 进行高校口译教学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特别是“语言游戏论”指导下、合作原则基础上的层级性互动模式研究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5. 为我国口译研究提

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本书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市场需求与高校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得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著出版经费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特别感谢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为本书作的序言及对书稿提出的珍贵的、很有价值的建议;非常感谢李波阳、陈许二位教授对书稿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非常感谢科学出版社郝建华、刘彦慧两位编辑对本书审校、出版、发行所做的大量工作。

非常感谢所有专家、学者、教师以及国内外网站的相关资料。为保持相关内容的完整性,部分文献引用较为充分,特加以说明。书中著名口译人才培养专家的资料也未能够全部、真正体现出他们的最新成果与业绩,在此向他们表示歉意。

同时也感谢我的丈夫孙运有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与我一如既往的关怀、支持、鼓励和帮助,本著作的顺利完成倾注了他部分的心血。

本书属综述性著作。虽然作者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前期研究、观点及文献资料,但依然感觉其欠缺。特别是本人研究领域的部分成果还未能在著作中得到深刻体现,希望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能够得到充实和完善。书中观点实属作者个人理解与意见,不妥之处请读者谅解,并欢迎提出宝贵意见。愿与广大专家、学者以及所有读者共勉,将口译研究继续深入下去。

郭兰英

2007年8月于杭州下沙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口译研究综述	1
1.1 口译的发展研究	1
1.1.1 口译的定义	1
1.1.2 口译的历史	3
1.2 口译的理论研究	5
1.2.1 释意学派的翻译理论	5
1.2.2 口译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8
1.2.3 口译中的交际功能	23
1.2.4 口译中的多变语言能力	26
1.2.5 口译中的语用意义	28
1.3 口译研究成果综述	35
1.4 本项目研究的特点	39
1.4.1 理论意义	39
1.4.2 研究方法	40
1.4.3 语料来源	42
第二章 中外口译人才培养研究	44
2.1 联合国口译员回顾	44
2.2 国外口译人才培养	46
2.3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	49
第三章 中外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54
3.1 中外口译人才培养机构设置	54
3.1.1 国外著名口译人才培养机构	54
3.1.2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教育层次	57
3.2 中外口译训练模式梳理	73
3.2.1 吉尔模式	74
3.2.2 厦大模式	76
3.2.3 微格教学口译培训模式	77

3.2.4 “3P”口译教学模式	78
第四章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的专业化	79
4.1 中国口译人才专业化培养的现实意义	79
4.1.1 口译人才市场需求的现状分析	79
4.1.2 口译人才市场需求的层次类型	82
4.2 口译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特征	84
4.2.1 口译人才培养出口的社会定位	84
4.2.2 口译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86
4.3 口译人才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	88
4.4 口译人才培养方案的比较分析	90
4.4.1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会议口译专业方向)	91
4.4.2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	92
4.4.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国际会议传译方向) (MA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93
4.5 著名口译人才培养专家介绍	95
4.6 口译培养的专业技能训练	101
4.6.1 “魔鬼训练”	102
4.6.2 “影子训练”	103
4.6.3 相关技能训练与提高	103
第五章 大学生口译能力的开发与提高	105
5.1 大学本科口译教学的目标定位	105
5.2 大学生口译能力的开发与抑制	106
5.2.1 语言学习策略对口译能力的抑制	106
5.2.2 认知误区对口译能力的抑制	108
5.2.3 训练机会不均对口译能力的抑制	110
5.2.4 心理素质对口译能力的抑制	111
5.2.5 知识底蕴欠缺对口译能力的抑制	112
5.2.6 大学生口译能力抑制的应对策略	113
5.3 合作原则下的交互性口译实践研究	114
5.3.1 交互性口译实践研究的背景	114
5.3.2 口译实践中合作性学习的原理与技巧	116
5.3.3 口译课堂教学的交互性模式	118
5.3.4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口译教学	124

5.3.5	口译课堂教学交互性实践的评价	129
5.3.6	口译教学互动性实践中的问题与应对	130
第六章	口译人才资格认证项目研究	132
6.1	国外口译水平考试及资格认证	132
6.1.1	澳大利亚国家翻译人员认证(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简称: NAATI)	133
6.1.2	(美国)联邦法庭口译员资格考试(The Federal Court Interpret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简称 FCICE)	134
6.1.3	中日口译能力鉴定测试	136
6.2	中国翻译资格证书认证项目	137
6.2.1	国家翻译人才资格认证项目	137
6.2.2	地方性口译资格认证项目	143
6.3	口译专业学历、学位证书(研究生层次)	151
6.3.1	会议口译专业证书	151
6.3.2	翻译学(会议口译方向)硕士学位证书	151
6.4	口译证书项目比较与分析	152
6.4.1	中外口译资格证书认证比较	152
6.4.2	中国口译资格证书认证比较	161
6.5	口译资格证书应试研究	164
6.5.1	应试者常见的问题	164
6.5.2	专家点评与分析	166
6.5.3	精彩范例	171
6.5.4	中国口译资格认证的前景	173
第七章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的规范化	175
7.1	高校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的途径	175
7.2	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中的问题及对策	176
7.2.1	机会均等与口译实践的规范化	176
7.2.2	口译人才培养层次及标准的规范化	177
7.2.3	口译教学及课程设置的规范化	179
7.2.4	口译测试及质量评估的规范化	180
7.3	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的方向与展望	181
	结束语	182
	参考文献	184

第一章

口译研究综述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通过人员或机器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活动。翻译又分为笔头翻译和口头翻译，即笔译和口译。

长期以来，和笔译相比，口译总是居于次要地位，对口译理论、口译技巧的研究，对口译人员的教育、培养，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吕国军，2005：44）。就国内情况而言，近年来，研究口译及口译史的论著才逐渐多了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预示着我国的口译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强劲的发展期。国际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虽然对口译的研究发达于中国，但同笔译研究相比，还是少之又少。

1.1 口译的发展研究

1.1.1 口译的定义

在许多印欧语言中，如日耳曼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斯拉夫语，用于表述做口译的人的词可以追溯到阿卡得语（Akkadian）中——一种亚述和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1900）时使用的古闪米特语。“dragoman”（口译人员）一词就是从那来的。英语中“interpreter”（译员）来自拉丁文“interpres”，即解释者，解释模糊不清的话语的人。这个词的语义学来源不清，一些学者认为后半部分来源于“partes”或“pretium”（价格的意思）。具有“中间人”、“商业的联系人”的意思。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源自梵语。无论这个词汇的语义学词源如何，拉丁语“interpres”指的是“解释意思”的人，即说明他人有困难理解的话语的意思的人。从辞源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口译理论研究大都

集中在有关如何“解释”的各种命题上(张文, 2006: 7)。

关于口译的定义曾有许多专家、学者根据不同的侧重因素做出不同的阐述。根据释意理论的观点, (同声)口译不等于代码转换, 而仍然是一种释意现象(鲍刚, 2005: 70)。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校长勒代雷(Lederer, 2005: 12)认为: 翻译是由交际双方和两种不同语言组成的交际活动, 这种交际同使用同一语言的交际有相同之处, 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因素。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刘和平教授认为: 口译同笔译一样, 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而且是不同语言社团重要的交流形式, 是两种思维的转换过程(刘和平, 2005: 14)。口译大师钟述孔先生在其《实用口译手册》中曾经定义: “Interpretation, essentially, means an extempore oral reproduction, in one language, of what is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钟述孔, 2003: 1)。他的定义强调即时的口语语言运用的再创造。台湾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杨承淑教授提出: 口译是在某一定的知识领域或组织团体内所进行的口说沟通行为(杨承淑, 2005: 7)。刘宓庆认为: “口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传播行为, 是互不通晓对方语言的双方得以交流思想, 进行和完成交谈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手段。不仅如此, 口译还是保证交流(传播)质量、速度、效果甚至重点等等重要元素的不可或缺的杠杆”(刘宓庆, 2004: 57)。他所强调的是口译的传播意义。李越然把口译称之为“以口译技能为主要标志的思想交流桥梁。”(吕国军等, 2005: 29)张维为根据口译的方式对连续口译和同声传译分别进行了定义。他认为, 连续翻译指的是即席翻译, 即议员等讲话人用原语讲完一部分或全部讲完以后, 再用译语把讲话人所表达思想和感情, 以口头的形式, 重新表述给听众的一种翻译实践。而同声传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思想和情感, 以与讲话人几乎同步的速度, 用口头形式重新表述出来的一种翻译实践(张维为, 2002: 6)。上海外国语大学梅德明在他编著的《中级口译》(第二版)中明确定义: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 将所听到(间或读到)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 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工具(梅德

明, 2003: 5)。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文教授对口译的概念进行了较全面的界定。她认为, 对“口译”的概念界定应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 即: 口译是语际间的“解释”行为; 口译是一种即时性的活动; 口译是一种特定的翻译形式。根据这些特点, 她给口译作出了如下定义: 口译是在人们跨文化、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 为消除语言障碍, 由能运用交流各方所使用的语言的人, 采取口语表达方式, 将一种语言所表述的思想内容以别种语言做出转述的即时翻译过程。

上述定义, 虽然语言表述不同, 意义侧重差异, 但都基本表达了口译的特点或过程。因此, 我们可以将口译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不同语际、即时产生、口头形式、轻语言外壳、重信息传播的语言交流活动。

1.1.2 口译的历史

无论是在我国, 还是在西方, 可供考证的有关口译的历史资料很少。然而, 翻译, 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 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 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 无不与时俱进(刘和平: 2005: i)。口译也是如此。

口译(同声传译)的历史源远流长, 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自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交往开始, 就产生了口译活动, 而笔译活动只是在人类发明文字以后相互交流的产物, 因而口译的历史远比笔译的历史悠久。古代不同民族因战争或通商而接触时一定有过无数传译员, 有时甚至无法直接传译, 而必须借助翻译成另一语言中介再沟通(例如现在中韩沟通时先翻译成英文, 再翻译成各自的语言)。口译既然是伴随着战争和通商而生, 其脉络就是一个协商的场合, 那么口译自然不只是忠于原意, 而也必须关注到协商的技巧、说者与译者之间的彼此共识、以及传译者的熟练世故了。

在漫长的人类原始社会, 原始部落群体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属于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种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 各部落群体便产生了跨越疆域、向外发展的愿望, 产生了不同语言的民族进行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的

需要。语言不通显然成为影响跨民族交流的最大障碍,而口译作为中介语言媒介可以构建人类跨文化、跨民族的交际活动的桥梁,使人们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愿望得以实现,因此,双语或多语口译应运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般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的通用语言是法文。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等都曾规定法文是这些组织召开国际会议中唯一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法文逐步失去昔日那种垄断地位,而英语的使用则日益广泛,在国际会议中出现了英语和法语并用的局面。英法两种语言并行不悖的局面同时也为口译(同声传译)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提供了机会。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开始借助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进行谈判。其中一部分谈判采用了同声传译,这也意味着同声传译作为一种专业开始正式形成。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口译活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润滑剂。人类的口译活动忠实地记录了千百年来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卫生和教育的交往活动。古代社会东西方文明成果的交流,佛教、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向外传播,文成公主婚嫁西域,马可波罗东游华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郑和下西洋,鉴真东渡扶桑近代社会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的曲折复杂;现代社会两大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今日信息时代的“地球村”的发展,欧元区的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欧亚峰会的召开等等无不留下口译的烙印,在人类的跨文化、跨民族的交往中,口译起着非常重要的催化剂作用(梅德明,2003:3)。

1920年代以前,西方世界的共通语言是法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势力壮大,英语才成为国际语言之一。外交谈判时英语法语同时有人讲就需要传译了。1919年巴黎和会首度试用同声翻译,但是设备原始,传译员没有训练,因此只是实验。过去用法语作为国际语言,与会者都必须会听法语,因此大家不必传译。

1940 年代中期盟军在纽伦堡大审纳粹战犯,历时十年,牵涉到十余国,因此奠定了同声传译的地位。因为法官来自多国,不懂其他法官,也不懂控辩双方和证人的语言。联合国时,中、法、英、俄、西成为工作语言,1970 年代开始阿拉伯文日渐受重视,六语同用。当愈来愈多没有机会熟练法语的国家与会(联合国的成长),法语的独霸受到挑战,多国语言并用时(有文化权力的竞争),口译成为必要,不但沟通异国,也斡旋其中的竞争和合纵连横。

同步口译(同声传译)只有短短几十年历史,但是设备、工作方式、专业守则、教育学校都逐步建立起来——这样的快速专业化脚步和它所立足的慎重场域要求很有关系。

专业口译的总人口大约二千人,集中在纽约、布鲁塞尔、巴黎、日内瓦等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传译人员的驻地。沃太华、香港、以色列、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多语国家也经常需要传译——这里的每一个区域都有其特殊的语言权力环境,操作起来也不一样。常用口译的单位涉及:国际机构、政府、法庭、警署、工商机构、文教机构、旅游事业等。

1.2 口译的理论研究

前面已经谈到:“口译”的英语“interpretation”的动词“interpret”来自拉丁语“interpretari”,意思是“explain”,为解释之意,因此,口译的功能与作用就在于解释。我们也理解了口译的定义:口译行为是一种语际解释行为(explanatory act),它的依据是原语的语言符号化表现,通过对语言符号化表现的解释获得对原语意义的理解。

1.2.1 释意学派的翻译理论

释意理论(theorie du sens)是国际上第一个系统的口译理论,一度成为口译界的主导性理论,特别是对口译教学与培训影响很大。该理论也是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并对我国的口译理论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柯平曾经在《中国翻译研究》2005

年第 1 期上发表《释意学派的翻译理论》对释意学派理论进行综述分析。释意学派(l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或 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le théorie de sens/the theory of sense),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一个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玛丽安·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是其创始人之一。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是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这种看法与语言学派(如 George Mounin 等人)的观点差别颇大。该派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其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有着独特的启示。

释意学派的摇篮是巴黎高等口笔译学院(ESIT)。该学院始建于 1957 年 10 月,1984 年 1 月成为巴黎第三大学下属高校,是全世界第一所有权授予翻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高校。学院下设三个系:口译系、笔译系和研究生系。口译系学制两年,第一年学习即席翻译,第二年学习同声传译,每周总课时约 24 小时。创始人塞莱丝柯维奇出身译员,曾为戴高乐总统等国家元首担任口译工作,是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1973 年获得国家博士称号(林煌天主编,1997:572)。研究人员在会议口译实践的基础上,借鉴神经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genetic psychology)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整套口译理论,随后又将其扩展用于非文学文本(或称“实用性文本”)的笔译研究。这就是被称为“释意学”或“释意模式”的翻译理论。

自 80 年代以来,释意派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十几本重要的翻译论著相继问世,研究范围也从最初的口译逐步扩展到笔译、科技翻译、翻译教学和一般翻译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塞莱丝柯维奇和勒代雷 1984 年合著的口译教程《释意翻译》(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一书,用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的成就来阐述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对比口笔译的异同,揭示即席翻译及同步传译的基本规律。该派理论最新的一部论著是勒代雷的《现代翻译——释意模式》

(La traduction aujourd'hui, le modèle Interprétatif), 出版于 1994 年。该书已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

释意理论将逐字翻译和句子翻译称为语言对译 (traduction linguistique / linguistic translation), 而将篇章层次的翻译称为篇章翻译或翻译。(许钧等, 1998: 193) 它认为: 成功的翻译应在篇章的层次上进行, 即对篇章进行释意, 因为句子是语法上的单位, 篇章才是语义单位; 翻译所译的是意义, 而不是语法, 不是单个的字词句。原文和译文的等值表现为整体交际意义上的等值, 即译文能在其读者或者听众那里产生与原文一致的效果。为达到此效果, 显然不能以词、句, 而应以交际意义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 (linguistic meaning) 和非语言的意思 (non-verbal sense) 区分开来。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 而是讲话人在其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也就是说, 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 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基于上述认识, 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 亦即交际意义; 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 是言语 (亦即语言的使用), 而不是语言本身。口译并非基于对原讲话人语言的记忆, 而是基于译者对原讲话人所传递的交际意义的把握以及随后用目标语言对该交际意义 (即讲话人的意思) 进行的重组。交际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交际参与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知识。译员听讲话的目的不在于进行语言分析, 而在于让有声语言链, 也就是有声音的一串话语, 唤起储存在自己大脑中的认知知识, 加上认知语境、讲话人、听众等因素, 在头脑中产生交际意义。也就是说, 交际意义的产生是语言知识同与其相伴随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结果。

释意学派的理论非常注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可以认为该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翻译的过程。释意理论认为, 口译时, 译员在把讲话人的话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话以前, 实际上要经过: 话语阐释 (interpretation or exegesis of discourse)、 “脱离语言外壳” (déverbalisation / de-verbalization)、原语信息内容的重组 (reformulation) 三个阶段。

释意理论对于口译、实用文笔译以及翻译教学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它明确地告诉译者需要译出的是什么东西(是意思,而意思是语言知识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产物);它要求译者弄懂自己所译对象的内容以及讲话人或作者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而不是像纽马克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使自己相信:自己译就的句子“从语言上来说是有意义的”(Newmark, 1988: 155)。

1.2.2 口译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口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际传播行为(interlingual communicative acts)。口译的哲学研究起着开拓和指引口译发展方向的作用,其规律性、实践性、经验性、解释性、认知性和多样性将指导我们揭示口译规律、进行口译分析、口译教学和口译研究。

译论家霍姆斯(James S. Holmes)根据美国哲学家韩普耳(Carl G. Hempel)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 3.1)一文中的论述指出:翻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也曾总结语言的特征时说“语言”实际上是“声音意象”(sound-image)和“词语意象”的“储存库”(a storehouse), (Saussure, 1915)。很显然,“储存”是“时间的产物”,离不开“历时经验”。布隆菲尔德根据自己的语言研究也认定,语言学的“经验性”是毫无疑问的(Robins, 1990)。哲学家维根斯坦在其后期的研究中对他的语言哲学观做出了一个既感性、又极富启发性的简约表述,提出了“语言游戏”论(language games),他坚信日常语言最自然,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形式”(a form of life)。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界认为维根斯坦是在倡导哲学和语言学向自然回归。

翻译大师刘宓庆(2004)将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运用于口译实践进行阐释,从而奠定了其口译的主要哲学基础,也论证了口译语际传播行为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及其对口译研究与实践的指导作用。

口译活动并不是一种机械地将信息的来源语符号转换为目标语符号的“翻语”活动,而是一种积极地、始终以交流信息意义为宗旨的、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译语”活动。口译也不可以孤立的以词义和

句义为转换单位进行单一的语言活动,而要兼顾交际内容及所涉及的话语意义、话语意义、言外寓意、语体含义、语境意义、体语含义、文化含义等信息的综合性语言活动。因此,口译不仅仅是语言活动,而且还是文化活动、心理活动和社交活动。

“语言游戏”论是维根斯坦对自己的语言观所作的一个既感性、又极富启发性的简约表述。根据维根斯坦的描述,语言游戏具有如下明显特征:它具有自主性,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对象,而在于使用的正确与否;它不需要用其他的目的或标准来证明,也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而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需对它加以反思;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本质;它必须遵守规则,不同的规则带来了不同的游戏,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用法(刘宓庆,2004:40)。

维根斯坦认为,语言并不是静止的逻辑构造的产物,而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活动,它不仅包括语词和语句,而且还包括说话时的行为操作等活动,只有把它们与人们的生活活动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语言也必须有说话者共同遵守的规则,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使用规则下,它的意义也不一样。所以,要正确地说话,就不仅要认识各种语词,而且还必须懂得使用这些语词的规则,否则,就会产生各种词义的误解,从而引起各种“形而上学”的纠纷。在肯定语词意义的可变性基础上,维根斯坦进而肯定了语词的多义性,认为日常语言的语词多义性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只要根据不同的语言游戏规则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它们,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理解上的混乱或误用。

在人类语言交际的方式中,听说是最基本的、最首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交谈便成为最常见的语言交际活动。成功的交谈是参加交谈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要使交际成功,参加的人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交际目标,以确定时间、解决问题、协调行动等等。

口译是特殊环境下的语言交际活动。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口译使得人类语言交际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根据刘宓庆对哲学家维根斯坦意义、表现、理解和解释四者关系所作的阐述,口译行为是一

种语际解释行为(explanatory act),它的根据是原语的语言符号化表现。通过对语言符号化表现的解释获得对原语意义的理解,“释意”可以说是口译的基本功。与此同时,维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最自然,它是人们的一种“生活的形式”,“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方式”(to imagine a language mean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Wittgenstein, 1945: Prt I, §19, 8e)。口译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下棋,A说一句或一段,接着B说一句或一段,如此轮流,直至结束。因此,口译又是一种“语言游戏”。任何游戏都有规则,没有规则不成其为游戏。不管是我们人类社会准则也好,还是我们所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也好,这都是规则。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所理解的游戏并不是简单的我们用语言来玩游戏,而是说我们所有的语言活动其实都是一种游戏,换句话说我们使用语言的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游戏(江怡,2002)。口译既然是语言游戏,也就有其游戏规则。在口译中,人们不仅要熟悉口译规则、遵守口译规则,更要学会驾驭口译规则,以获得口译交际的最大效果。

“语言游戏”论是维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哲学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在社会语境中存在与活动,多元而且开放,不必处处受到语法规则的制约,浸润着的是人文主义的营养。维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讲到:“我们越是仔细地去考察实际的语言,它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越尖锐,因为逻辑的晶体般的纯粹性当然不是研究出来的;它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从此可以看出,对语言的理解,显然不能仅从逻辑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屈哨兵,2002)。

按照维根斯坦的理解,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就是语言与行为的一种结合。“我也将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与前期的逻辑语言模式相比较,语言游戏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来加以把握。“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在《哲学研究》中,维根斯坦列举了诸如演戏、唱歌、猜谜、编笑话、讲笑话等多种语言游戏的形式。他认为:“命令、提问、叙述、聊天如同走路、

吃喝、游玩一样，是我们的自然史的一部分。”本来，既然语言是人类思想表达的途径，既然语言游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对词语意义的把握，也应从这一前提出发。后期的维根斯坦语言哲学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语言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实，语言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它不仅是人们交往的工具，更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文明。同样，对语言的认识和把握，仅仅依靠从逻辑和语法上把握是不够的，语言的丰富内涵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中，要真正理解语言，日常生活同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

维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反复提到“生活形式”这一概念。他所谓的“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地、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因而维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可指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个民族）思想行为的总体，又可指作为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个民族）之一部分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社区、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总体或局部。这些或大或小的生活形式的作用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它们又互相影响、互为前提，根本说来，它们是互相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此外，生活形式还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一种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实践，这是由一系列实践活动构成的；其次，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都以特定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为前提，因而任何生活形式都构成了人类自然史之一部分。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的基本构成成份的、能够相对独立地具有意义（这里特指人生意义）的最小单位的东西不是单个的事实，更不是事物（对象），而是生活形式（韩林合，1996）。

1.2.2.1 语言哲学思想对口译规则的影响

因为一个语言游戏的所有规则都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所以一个人是否正确地解释了某个语言规则或是否正确地遵守了它便可从它所处的语言游戏所植根于其中的生活形式的风俗、习惯、制度和传统

等看出。因此“遵守规则”是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实践，它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是一种人类生活现象。既然“遵守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而“遵守规则构成了我们的语言游戏的基础，它们刻画了被我们称为描述（即语言的使用）的东西的特征”，所以语言游戏也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韩林合，1996）。

口译是特殊环境下的语言交际活动。根据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翻译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游戏”（Wittgenstein, 1945: Part I § 23, 12e），口译和笔译都是语言游戏家族中的成员，存在着“家族相似”的关系。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口译使得人类语言交际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

口译是互不通晓对方语言的双方得以交流思想，进行和完成交谈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手段。不仅如此，口译还是保证交流（传播）质量、速度、效果甚至重点等等重要元素的不可或缺的杠杆。在口译传播中，媒介就是口译员。就信息而言，如果没有媒介，传播行为就不能实现。信息交流也就是以口译为媒介的双向（或多边）间的谈话（conversation），如果没有口译这个媒介，一切将无从谈起。

既然所有的“游戏”都有规则，翻译“语言游戏”（口译）也不例外。刘宓庆将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运用于口译翻译进行了阐释，并总结、归纳了“口译翻译游戏”的六条重要“游戏规则”（刘宓庆，2004：61），本文将其概括如下：

（1）强调口译的5个基本要素：即，解释的基本原则、传播媒介的基本职责，职能保证下的参与的基本功能，相对操控的基本权利，能动而不僭越的基本行为准则。

（2）遵守 Grice 提出的合作原则（CP），同时又有不遵守合作原则的权利。

（3）承认口译员相对的操控权力，同时又有挑战口译员职责权力的权利。

（4）禁止话语霸权，但不否认“话语霸权”普遍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5）密切关注但没有权利和义务揭示一切“不在场”的潜隐意涵。

(6) 承认“不在场性效应”对口译传播的潜在影响；同时，善用“传播得以实现者”的作用，但能动而不僭越。

上述规则既对口译员又涉及会话各方。每一规则都直接影响人们的口译行为与实施，也影响口译的质量与效果。在口译中，以原语者为一方，以译语者为另一方，都是口译语言游戏的参加者，都可以以平等权利（及权力）参与口译语言游戏。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没有平等权利（及权力），译者也好、译语也好，都将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根据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点，对所有的游戏参与者来说，遵守规则都是强制性的（Wittgenstein, 1945: *Prt I*, § 219, 85e）；人们是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学会遵守规则（Wittgenstein, 1945: *Prt I*, § 54, 27e）；想要游戏成功地进行下去，就要从“遵守规则”跃进至“驾驭规则”。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对立统一的。因此，维根斯坦也提出了“游戏规则”的辩证性质：“It is not everywhere circumscribed by rules—游戏并不是处处都要受到规则的约束”（刘宓庆，2004：24）。在上述规则中我们也看到，几乎每一规则都具有其相对性及辩证性，维根斯坦称之为“规管游戏的自然法则”（a natural law governing the play）。实际上，“语言中并没有什么充分至极的规律性”（There is not enough regularity for us to call it “language”）。在口译中，我们不可能找到可以规管一切口译现象和行为的规则。关键是首先要遵守规则，并通过口译实践去驾驭规则，获得会话双方之间的平衡，实现口译的最大愿望与最佳效果。

1.2.2.2 语言哲学思想对口译研究的指导作用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Peirce，1839—1914）曾经作过论述：社会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为的因素，而是取决于事物本身积极的存在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取决于它的功能发挥、功效发挥和它在社会历史、文化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口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口译的观念、方法、形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当多元文化社会高度发达的时候，口译

因积极参与主流文化的良性富集和发展受到空前的重视,口译传播的整体质量将有极大的提高和增长,口译的“不可或缺性”(indispensability)及作为多元文化发展的巨大催动力将与日俱增,口译的参与功能将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口译涉及不同的语言、民族、文化、历史、环境、等等,各民族之间又存在着共识文化,不同的民族的语言里又都会有相同的概念蕴涵,因此,我们认为在口译及口译研究中,语言哲学观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维根斯坦理论,口译是一种“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特征是参与,只有通过会话人的参与才能使口译成为“语言与活动的交织而组成的整体”(the whole, consisting of language and the actions into which it is woven), (Wittgenstein 1945: Prt I, §7, 5e)。

在维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语言游戏规则是反映人类的生活行为的基本方式:普天之下的人的“普遍的参与”。普遍参与带来的是全体参与者的全程互动(interaction)、合作(cooperation)与默契(tacit understanding),这是任何游戏包括语言游戏的普遍特点,口译当然也不例外。口译中A说一句或一段,接着B说一句,如此轮流,直至结束。这种循环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的提升过程,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环节紧扣,实现更高平台上的互动性合作。支配人类言语行为的“复杂概念化能力”,即意指(signification)能力在日常多维互动的语言经验中,经过三个平面(意义意向、审美感知、逻辑校正)相互交织的分析综合加工、积累而形成。从理论上讲,口译经验产生于口译感知(perception),即口译行为认知过程中的初始活动,又高于口译感知;口译经验的积累在于提升(upgrade)、优化(optimize)、和提炼(extract)经验,而不是停止于经验;口译的经验积累也并不意味着口译经验的终结。在普遍原则推动和指导下的口译行为将产生新的经验,新的口译经验又需要进一步得到提升、优化、和提炼,再通过理论化上升到新的认知平台,使普遍原则得到检验、调整和修正,从而构建出新的普遍原则,进入到更高理论层级。新的普遍原则会推动人们在新的原则指导下,面对(观察、分析)新的口译现象,实施新的口译行为,从而推导、推衍、发展出高一级平台

上的更新的普遍原则。这样,就避免了口译中的唯心主义和唯先验论。

1.2.2.3 语言哲学思想对口译研究的辩证性作用

语言哲学观不仅承认语言的共性,强调语言、文化的特性,更注重二者的辩证与统一。“一方面,人类的语言应该是统一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有共通之处;所有民族都具有语言,语言是‘自动、自发地’从人类的内在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反映了人类统一的存在本质。另一方面,语言是一种民族现象,各民族的语言在结构形式、意义内涵上有所不同,一定的民族语言与一定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相维系。人类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或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伍铁平等,1988:58)。

口译的理论、原则、原理、规范的构建必须基于具体的口译行为,具体的口译行为必须在两种(或多种)具体的语言之间、由具体的人来执行,这个“人”又必然是在某种具体的人文环境中、操某种具体语言(母语)的人。因此,口译表现出两种属性(attributes):即共性(universality)和个性(peculiarity)。我们进行口译研究时,不仅要注重研究口译理论的共性,同时,更要注重研究口译理论的个性。

1.2.2.4 语言哲学思想对口译语境的影响

语境(context)概念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提出的。语境概念的系统研究较早出现于社会语言学家的论著。他们对语境的兴趣主要是出于解释语言外各种因素对语言表达方式选择的影响,以及如何确定在特定交际情景中语言的社会合适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语境对语言的制约作用(何兆雄,2002:18—19),Lyons是其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语境是一个理论概念,构成语境的各种因素是语言学家从具体的情景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因素对语言活动的参与者所产生的影响系统地决定了话语的形式、话语的合适性或话语的意义(Lyon,1977:572)。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 N. Leech)曾明确指出语境是“假定被发话人和受话人所共享的背景知识”(Leech,1983)。

哲学家维根斯坦的论断是“意义即使用”(meaning is the use)(Wittgenstein, 1945 : Prt I , § 138 , 53e)。他考察说,意义之所以取决于用法,是因为意义“肯定必须属于某一语言的某一语境”(…they must surely belong to a language and to a context), (Wittgenstein, 1945 : Prt II , § xi , 217e), 语境使意指确定化、具体化,“语境—用法—意义”之间具有互为条件的联系。刘宓庆将这种联系看作是极其重要的翻译规律,是“翻译语言游戏”最基本的法则(刘宓庆, 2004 : 27)。并且,他从口译这种特殊形式的语际传播行为(interlingual communicative acts)出发,对口译的语境系统进行了概述。哲学家维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最自然,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生活的形式”,即现实情景。“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的形式”是语言成为游戏的基石、基础和依据,它不是任何人能臆造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交流和使用经验就是这样(Wittgenstein , Prt I , § 7 , 5e ; § 494 , 138e), 它们是复杂的生活形式的模态(modes), (Wittgenstein, 1945 : Prt II , § 1 , 174e)。

维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论是他“意义即使用”观点的基本依据。在口译中人们可以凭借“使用”来把握意义和意向并赋形(外化)为表达式,即运用感性为原语的意义和意向寻求符合情景的译语。他认为语境—用法—意义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他还认为不仅意义受制于语境,意向也含蕴并受制于语境,“意向依附于情景中”(An intention is embedded in situation), (Wittgenstein 1945 : Prt I , § 337 , 108e)。 “境中有情,情为意表”,从把握情境分析大体的意向,并表现在语言中。可见,维根斯坦非常重视语境,“没有语境”(free from any context)的意义应用,无确定的意义可言。

维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论对口译研究产生极大的启迪,它揭示了口译语言游戏的“生活形式”的本质及其相似性;口译的“普遍参与”带来的全程互动(interaction)、合作(cooperation)与默契(tacit understanding)反映了人类的生活形式的基本方式;“生活形式”作为口译的价值标准规范了口译的意指(signifying)、理解都应该不悖于“生活形式”即现实事实;“生活形式”的表现论还强调了话语表意

的明晰性(clarity)、语句意涵的连贯性(coherence)、及语体的适境(adaptability)。维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论赋予了语言以最高的人文性,也赋予了他的语言观最高的人文性(刘宓庆,2004:33—37)。

1) 口译语际传播的语境化特征

语境是一个广义的范畴概念。它可以小至词语搭配,大至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由此形成了一个语境的层级(levels)系统即:搭配、上下文(context 语句)、语段(句、句群)、话语或文本(discourse or text)等微观语境,也包括文化历史背景等宏观语境,即“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对翻译而言,孤立的词,即没有语境的词是没有固定意义的,这就不同于辞典学(lexicography)。辞典中的词都不是 words in action,只有“备而待用”的功能(刘宓庆,2004:66—67)。

鉴于口译传播是一种“语言游戏”,是复杂的“生活形式”。口译行为处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意义和意向蕴涵都寄于快速发展的语流,而且瞬息即逝。只有其特殊的语境才能使每一个词的意义在其所在的语句联立关系的时空条件下相对固定下来,以使口译交际顺利进行下去,实现合作。

2) 语际转换的时限性与语义对应的相对扩展性

口译语际传播是通过话语来进行沟通,通过声音传达信息,具有速度快、单位时间内信息量大的特点。如果不在瞬间尽快捕捉信息的话,将即刻消逝。在接续口译(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话语语流这一特殊的认知语境和行云流水般的话语语境中,口译的“即席性”(promptitude)要求译员在2—3秒钟内对接受到的原语做出反应,将译语产生出来,当场实现语言转换交流,不容延宕。2—3秒只是稍迟于“语音未落”(刘宓庆,2004:63)。这样快的时差,又要求准确性和较高的组织程度,给口译员带来语际转换心理加工的复杂性及语言再造的巨大压力。口译“即席性”要求的直接结果是双语转换中语义和形式对应幅度和容忍程度的宽泛化。由于译员必须快速做出反应以保持自然的谈话进程和语速,就不能要求他们出口成章、用词精确、文句完美、逻辑严密。这是话语语境具有的紧迫性给语际转换带来的抑制之一。

语义对应幅度和容忍程度的宽泛化指话语语境迫使口译中语际

语义对应要求的放宽,即从基本词义向范畴词义对应延展,或从基本语义范畴扩展到不同形态的功能范畴。这是口译语际传播基本的应对策略之一。

演变后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认为:语言并不是由所有描述事实的命题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而是由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原始(简单)或高级(复杂)、功能各异、彼此间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世界并不是由所有可描述的事实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而是由各种各样、作用各异、但又互为前提、互相交织的生活形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语言“家族相似”性使得语言符号范畴成为一个模糊的集合体,任何一个范畴概念的语词与任何一种特殊称号的同等语词形成对应关系,如:语词“家庭”(family)。无论是单独提到“家庭”一词,或是在任何社会语境下谈到的“家庭”时,人们都会联想到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尽管家庭结构不同,生活模态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但都具有其“家族相似”性,都可以互相对应。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论证:翻译中的“对应”(equivalence)是一个“范畴”(category)。这个“范畴”中不存在等值、对等、等效,只存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相似性”。口译员的任务是在即席性要求下寻找最适境、最贴近的相似性,依此做出解释。口译允许在“家族相似”前提下尽可能给对应“松绑”,而且,这个“绑”松得越及时、越恰当、口译的效果也就越好(刘宓庆,2004:73—77)。

3) 会话含义的复杂性与语言质素的低层级性

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 Grice 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会话中的“弦外之音”或“言下之意”。口译具有现时、现场、限时的特点,根据 Grice 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口译语际传播行为要求交际双方避免晦涩的词语;避免歧义;说话要简要、避免赘述;说话要有条理。然而,这条准则只是约定俗成的规约,不同于严格的语言规则,并不是绝对不可违反的。由于会话是“生活形式”中的“语言游戏”(Wittgenstein, 1945: Part I, § 23, 11e),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都是语言游戏的参与者;只要他(她)遵守规则,他(她)就完

全有权驾驭规则，而绝不“墨守成规”。在合作原则下，口译时可以允许有“弦外之音”、“言下之意”。

与此同时，语言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使口译传播者的会话含义更加多元化、复杂化。词语本身都具有意向性。句子的意向性是意向性词语意义的汇总、融合、延伸、扩展与折射。词语的意向性与上下文、语句、段落、篇章及话语的语境密切相关，形成其“意向化”(intentionalization)。意向化表示会话人的“态度”、“目的”、“意图”等等主观意识。口译中，会话人都有各自的意向，有可能遵循合作原则，也都有可能行使不合作权利。在话语情景语境中，往往由于合作原则的违反，使会话含义变得复杂化。特别在商务口译及谈判话语语境中转弯抹角、言不及义、语无伦次、语义模糊等等，都要依赖口译员积极意义上的操控，利用语音、停顿、反复、反问等等手段，使会话含义标志化。会话含义是显性和隐性的结合，发之于外，隐之于内。会话含义的隐性才是真正产生效果的部分。

口译传播的“生活形式”以及口译传播的“即席性”特点致使口译传播话语语句组织欠佳，处于“无序状态”(disorderliness)，这正是日常语言的特点。也正是会话语境的这种客观局限性造成了口译传播最基本、最突出的制约。在实现了口译的即席性，保证了口译语言游戏不间断地进行下，口译质量便处在了语言表现(representation)的“低层级化”。语言表现是层级概念，语言表现的“低层级化”并非是指“低级化”，基本特点是相对于书面语体的结构松散，不求语句组织的严谨、规范，冗赘和重复成分多，随想随说，语流中突然插入直接引语，行文中常见断续，俚俗语屡见不鲜。此外，口译传播中语言质素的“低层级化”还表现在语言审美要求的“边缘化”(基本达意)，隐喻效果的淡化(“去隐喻”，demetaphor)，情态色彩的“中立化”(鲜明情绪表现的弱化)等等。尽管口译传播中有着这些缺点，但是，语言来自日常生活，是生活的形式，口译即时、即席传播意义的基本功能无可厚非(刘宓庆，2004：85)。

4) 会话主题的不可预测性与语言外知识空间的无限性

口译是一种具有不可预测性的即席双语传言活动。口译话题千变

万化,往往难以预测。译员或许可以通过事先确定的交谈主题来预测交谈各方的话题,但是,议员的任何估计都不可能是充分的,而且主观预测也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危险的(梅德明,2004:7)。译员必须随时独立处理可能碰到的任何问题,如:语言问题、知识问题、文化问题、民族宗教问题、传统民俗问题;有些属自然科学类,与学科知识有关;更多的属社会科学类,与社会、文化、国情、时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有关。面对任何一个问题,译员无法回避,无路可退,只有正视每一道难题,及时处理每一道难题。同时,依据知识准确地理解意义,也成为议员的基本能力。

Lyons 认为,一个人要能够正确判别话语的合适性,即意义的准确性,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即是语境的具体体现,或者说这些知识构成了语境。知识语境包括所使用的语言知识,即会话各方必须有共同的语言(何兆雄,2002:18—19)。然而,口译是语际间的传播行为,会话双方互不通晓对方的语言,不能通过直接对话进行交流,只能通过口译员的语言知识将原语意义准确转达给译语接受者。因此,口译员的语言知识至关重要。交际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的参与者不断产生话语,每一句话都和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必然联系,包括语义内容上和语法词汇上的联系,前一种联系又通过后一种联系得到体现,口译员了解一句话和上文的联系对正确理解该句意义非常必要。除语言知识外,知识语境还包括语言外知识,即:背景知识、情景知识及交际双方的相互了解(相互知识)常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也包括对社会文化规范、行为准则以及属于特定文化的会话规则的了解。情景知识指与特定的交际情景有关的知识,包括语言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主题内容、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参与者的相互关系、所处的相对地位,所起的作用。相互知识指会话各方共有的知识,及彼此之间对拥有这种知识的通晓。这种知识是会话各方进行语用推理的基础。

5) 以语境化特征为依据的口译推理

口译推理是在言语符号(verbal signs)、超言语符号(paraverbal

signs)、和非言语符号(non-verbal signs)三个参照系的整合性参照下,受话人利用这种三维制约的语义随机性情景化及稳定化了的机制进行的合理推理。口译中要求推理的目的是准确的理解,包括从词语到句段的意义及意向,以及顺畅的思维表达,其基本特征就是跨文化性(cross-culturalness)和语言性(linguisticity),也就是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因此,可以说口译的推理就是以语境化为依据的推理。

语用学认为,意义的确立依赖于语境。理解了一个词、短语或一句话本身的意义,即抽象意义,并不意味着就能理解其语境意义,还必须把语言文字本身的意义和它们的使用者及使用场合联系起来。除了要搞清一个单词、一个句子本身的意指外,还要弄清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对谁用了这个词或句子,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即实现一个词、一句话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具有的交际价值,即语境意义(何兆雄,2002:46)。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尤其在特定的语境中,有时对说话人所说的每一个字、词的意义均能理解,但仍然无法听懂说话人所讲的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如:“he”、“it”等指示代词,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话语语境,往往无法确定其意义所指,也就无从理解话语所要表达的意义,甚至会造成意指混乱或交际失误与障碍,有的还会引起严重后果。口译是语际语交际行为,对本族语者来说,凭借对话语和文化语境的了解,很容易确立一个词、短语或一句话的语境意义,能准确地从几种可能的意义中确定其中一种最恰当、最准确的意义;而对非本族语者来说,由于缺乏对象国语言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要准确理解语境意义并非易事,尤其是由于会话过程中话题的不断变换而造成无法确立其语境意义。

语用学还认为,意指的确立也依赖于语境。所谓“意指”实际上是交际双方共同参与合作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即说话人通过使用语言形式或语言表达式让听话人识别某一事物或人物。意指功能的成功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说话人的交际目的和信念,即他必须先估计和推断使用哪种指称语才足以使听话人识别某一特定的人或物;另一方面听话人必须借助语境知识对说话人所意指的所指对象做出准确的推理